

创业维艰毁誉多

——项英与皖南事变前的新四军(五)

(解放军)
胡居成

练兵与点验

1938年4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赴皖南歙县岩寺镇。

上午9时,南昌人民举行盛大的欢送会。当时在江西省政府保安队和抗敌后援会中担任要职的蒋经国,在会上作了希望团结抗日的讲话。他说:你们要到前线去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是送一个“杀”字,愿你们在前线多杀敌人。江西省抗敌后援会向新四军赠送慰问品,计有:棉背心1000件,棉军装1000套,布鞋2100双,草鞋1000双,雨笠204顶,毛巾240条,蕃薯片72斤。江西省农村合作委员会送鸡蛋2100颗。修水县抗敌后援会送蕃薯片110斤。

接过这些慰问品,项英的心情十分激动。3年游击战争,就是靠人民的支援才坚持下来;今后也将靠人民的支援取得抗日的胜利。他对夹道欢送的各抗日团体说:新四军战士绝不辜负你们的期望,我们一定狠狠地杀敌立功,报效祖国和人民!

5日下午18时20分,叶挺、项英率军部抵达岩寺。军部设在金家大屋,叶挺、项英均在此处办公、住宿。参谋处和副官处设在吴小亭家,

军需处设在潘瑞庭家,卫士排设在金家大屋隔壁曹氏屋内,军部机要科设在洪桥房子里。

新四军奉命在岩寺集中,主要是接受国民党第三战区的点验。早在去年11月间,蒋介石在南京接见叶挺和叶剑英时就说过:“南方游击队不能照八路军的办法办……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所谓“点验”,就是清点核定人员、枪械数量,决定部队的编制员额。蒋介石“必须派人点验”新四军的用意,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想借此抖一抖他的威风,压一压共产党的气势,消一消他因八路军“拒绝点验”而憋着的那口气。二是想查一查南方红军游击队是否真的全部集中起来了,他好对“后院”放心。

对蒋介石的企图,项英是心中有数。如果像八路军那样拒绝点验,新四军的组建、集结就可能搁浅;借点验之机,把部队集结起来,进行军政训练,提高素质,同时也趁机向老蒋再要点钱,要点装备,把部队武装武装,再开到前线去与日军作战,比仓促上阵更有把握。所以项英对蒋介石“必须派人点验”不仅同意,甚至还有点欢迎哩。

叶挺、项英一到岩寺,就同张云逸、周子昆、邓子恢等军部领导人,东奔西跑,穿行于岩寺附近的潜口、邕村、王村、西溪各个营地之间,亲

切地看望来自四面八方,说着多种方言土语的指战员们,向他们问寒问暖。

根据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合通知的要求,部队一面进行军事练兵,一面开展抗日宣传。叶挺的主要精力放在抓训练上,下决心提高部队素质。他拿出当年肇庆独立团初建时的那股劲头,亲自给部队上课,亲自到操场指导部队的演练。

由于枪械不够分配,战士们不得不轮换着练习瞄准,两三个人共用一件武器。还有一些战士仍然用梭镖、大刀进行操练。这种情景引起叶挺对国民党很大的不满,他亲眼看到过第三战区的国民党部队有大量多余的武器,但他们宁肯让多余的武器闲置起来,也不愿意发给新四军。为此,他一面提意见写呈文,继续找顾祝同要一些枪支;一面按照红军根据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经验,指示主持军需工作的叶辅平,想方设法办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新四军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内建起了一个简陋的修械所——皖南新四军修械所,由20个铁匠和木工组成,其中懂得一些枪械修理技术的只有朱宗山和罗克绳两人。修械所的主要任务是修理旧枪和配上刺刀。起初,每人每天只能打一把刺刀,后来技术熟练了,每人每天能打20多把,

修一至二支枪。

叶挺、项英的住处离修械所很近，他们经常来摸摸枪支，抡抡锤子，甚至坐下来帮助工人拉风箱。他们鼓励工人说：“我们应该埋头苦干，用革命的精神来克服困难，战胜困难。我们修的枪是拿去打日本鬼子的，枪修得不好，出了毛病，就要害自己人！”

皖南新四军修械所是新四军军部兵工厂最早的雏形。以后几经搬迁，在泾县云岭发展起来，达到了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单枪械的较高水平。以后各中支队驻地也都重视建设小兵工厂，弥补了一些武器弹药的不足。

项英除了负责新四军全面工作外，还拿出一定的精力、时间抓部队的政治工作和抗日宣传。他指示政治部把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以及王明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第三部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等作为政治教材印发给干部战士学习。经过上政治课，作形势任务报告等方式，对全体指战员进行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实行不同阶级、不同党派团结一致、合作抗日的统一战线政策教育。当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数量占全军人数的25%，但连队没有党支部和政治组织，不少班排没有党员。项英和陈毅、袁国平、邓子恢等进行多次研究，决定各支队建立党务委员会，各团建立党总支委员会，营、连建立党支部，并积极慎重地发展新党员。

在开展抗日宣传和民运工作方面，项英也特别重视。他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抗日游击战争和民运工作是不可分离的，没有民众运动的开展和深入，抗日战争就不可能坚持和胜利。”他特别指出，岩寺一带是新区，方志敏同志率领的红军

北上抗日先遣队虽然到达，但时间很短，人们对红军、尤其是对新四军不熟悉。这一带国民党军队很多，百姓们由于受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不了解我军。因此，我们要千方百计地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严格执行纪律，关心爱护群众，尊重地方政府，以实际行动证明新四军是真心实意的抗日队伍。

指战员们热烈响应项英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岩寺街头和各支队的驻地到处张贴着“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人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肃清汉奸”等抗日标语和漫画。作为军部开会场所的鲍家祠堂的山墙上，50年后还保存着一幅巨大的宣传画——两个大轮子支着一管高矗的炮筒，炮口下躺着四肢朝天的日本侵略者，轮子上写着：“国共合作，共同抗战”，左角的署名是：新四军服务团宣。

军服务团在岩寺广泛开展了战地服务工作，帮助群众组织妇抗会、农抗会、青抗会、工抗会等社会团体，利用文艺形式，自编自演紧密配合当时形势的小节目，教唱《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政治部、民运部和各支队、各团政治部门还到处举行抗日军民联欢大会、各军代表抗日座谈会，还办了两所农民夜校，项英、叶挺经常到军民联欢大会上发表演说，到上层人物的座谈会上去动员大家有钱出钱、有枪出枪，为抗日救国出力。项英还到农民夜校去讲课，把他在3年游击战争中编写的识字课本修改油印连同笔墨发给农民青年。项英对他们说：“你们要好好学习文化，不要小看自己，过去闹革命靠我们穷苦人，今天抗日也靠我们广大老百姓。你们只要刻苦努力学习，以后定能为抗日救国做好多事。”

4月的岩寺正是花红柳绿时节。乡村4月闲人少，叶挺、项英和各支队领导人，带头支援老百姓春耕生

产，战士们三五成群地分散到各户帮助乡亲们耙田、插秧、挑水、扫地，老百姓对新四军再也没有戒备心理了，他们和战士们无话不谈，亲如一家人。

岩寺，群情激奋，抗日星火如遇春风，呈现出燎原之势。

岩寺，这个小小的山镇，成了新四军的摇篮而名垂史册。

4月20日，一大帮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点验委员”们来到岩寺，首席点验官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九集团军司令罗卓英中将。罗卓英和叶挺是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10年前国共分裂时二人分道扬镳，罗成为受蒋介石青睐的“剿共”老手。他今天奉蒋介石之命前来点验，一方面履行公事，另一方面也想摆摆威风，显示一下自己。叶挺对此看得明白，心中也已想好对策。

这天，叶军长完全正规化装束。他身着缀有中将军阶的草绿色毛料将官制服，腰束横扎斜吊的制式武装带，脚穿锃亮的黑色长筒马靴，手执军可以用来探路、休息可以用来坐靠的精制枪管的手杖，英姿勃发地和罗卓英一起校阅部队。

作为“剿共”老手和蒋介石的点验执行官，罗卓英带着政治偏见和感情隔阂，以贵族老爷式的眼光，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察看着刚下山的游击队员们。对一些在年龄上偏老偏幼，身体上营养不足，使用的武器还是大刀梭标的游击队员，他摇头晃脑，作出一副歧视的表情。

对罗卓英的种种表现，陪同他点验的叶挺非常反感。点验仪式结束之后，罗卓英以他的观感和叶挺正式交谈。

“希夷兄，你对这些部队士兵的素质有什么印象？”这个“剿共”失败者把球踢给他的老乡、同学。

“印象总的来说是好的。”叶挺毫不犹豫地说，“最近我和许多士兵谈过话，他们都知道国家的危险处

亦真亦伪不足奇

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时期

的林彪其人(系列之七)

(北京) 黄少群

境,都有参加抗战的决心,而且大部份人打过仗,有作战经验。”

罗卓英讥笑着说:“有那么神吗?可我看到的士兵都很瘦弱,还有不合要求的老兵小兵,又都缺乏训练,要知道我们的对手可是强大的日本人!”

叶挺忍耐着说:“你说的有道理,不过训练可以补课,体质可以增强,只要搞一次整训,部队面貌将会改观,游击战争环境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

叶挺最后一句话的含义是:这些问题不就是你们对南方游击队3年的“清剿”造成的嘛,你们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

对中央苏区的四次“围剿”接连遭到失败以后,蒋介石仍不甘心。1933年秋天开始,蒋介石又集结了100万兵力,以50万专门对着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这一次蒋介石几乎是倾巢而出。他改变了前四次“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从军事、政治、经济上三管齐下,以达到“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的目的,妄图消灭红军,消灭根据地。

此时中央红军已发展到10万多人,如果像前几次反“围剿”那样,采取正确的战略策略,是可以有办法克敌制胜的。但这一次,中央革命根据地却遇到了危机。一是这年年初,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及其领导人博古等迁到了瑞金,使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苏区得以进一步贯彻;二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也于9月到达瑞金。博古将红军战争的指挥大权完全交给了李德,不但毛泽东早被排挤在了军事领导之外,就连周恩来、朱德也在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博古纵容李德包办一切,而李德则专横跋扈,大搞瞎指挥,推行“短促突击”、阵地战和堡垒战的战术。他们采取了先是冒险进攻,后是消极防御的错误战略方针,拒绝接受一切正确的意见和建议,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丢失,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

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1军团和彭德怀率领的红3军团及宁都起义后编成的红5军团是这次反“围剿”的主力部队,指战员们打得很苦,损失很大。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红1军团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嶂、乾昌桥和广昌战斗,由于都执行的是李德“短促突击”战术,不诱敌深入,除了凤翔峰、三岬嶂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红1军团损失严重。1933年12月的丁毛山战斗红1军团守卫阵地的1师3团有9个连队,竟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1个当排长的瑞金老表就在阵地上发牢骚道:“不知捣啥鬼啊!我们一夜不睡觉做了一个碉堡,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碉堡,我们只有用牙齿去咬!我们没有重火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啊!”

此时的林彪和聂荣臻一样,对李德的军事教条主

罗卓英装作同情地说:“武器这么差。这些人拿着这样残旧的枪甚至原始武器去和日本人交手,岂不是白白送命吗?”

说到武器,叶挺禁不住气愤起来,但他抑制住了。他说:“武器确实不好,这就要靠军委会和三战区帮助解决了。我在汉口和屯溪向何部长和顾长官屡次交涉,但收效甚微,希望你老兄在何、顾二公面前美言几句,帮我出点力。”

陪同点验的项英,因为是副军长,不便多出面讲话,但说到要武器(这是他同意点验的目的之一),他不

(下转41页)

(三)

自19日始,国民党陆军总部人马陆续奔芷江而来,一些应邀嘉宾也逐渐光临,接待工作也自然铺开。20日午后,何应钦上将亲率陆军总部参谋长肖毅肃以及30余名战区集团军总司令以上指挥官由重庆乘飞机抵达芷江。

晚宴后,陆军总部蔡文治副参谋长指示赵汝汉派两位军官书写何应钦上将下达给冈村宁次大將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赵汝汉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我与王甸明。接受任务后,我俩既高兴又担心,因书写备忘录要求中日文各抄一份,字迹清晰工整,大小匀称,一字不落,只字不差,难度很大,不容有半点疏忽。我俩皆是日文门外汉,自然谁也怕写日文。不知是谁提议抓阄定夺,还是我幸运,抓了个好阄儿写中文。备忘录所用纸张请印刷厂专门提供。书写毛笔特制精选,笔杆上刻着“日军投降典礼”6个金字。安排妥当,筹委会速着专人与陆军总部联系取回备忘录原样。就这样,我和王甸明在陆军总部日文翻译官陈××中尉陪同备询下,专心致志,研墨挥毫,挑灯夜战,一气书写完时鸡已啼鸣。备忘录全文共1250个字左右,分5个项目,对各地受降主官也予以附表说明。原稿由陆军总部王武上校起草,正式书写又是我们两个姓王的,因而当时人们皆戏传这是“三王爷下令日军投降”!

21日上午11时,冈村宁次遵照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指示,派出由陆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少佐前川冈雄及译员木村辰男等组成的接洽代表团,乘座一架由松原喜八等机组飞行人员驾驶的运输机在盟军战机群监护下飞经湖南常德上空,降落芷江空军机场,下机又转乘插有醒目白旗标志的两辆军用吉普车驶往指定地点静候召见。

午后3时40分,先由肖毅肃中将、陆军总部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于空军俱乐部召见日方洽降代表,认定身份,宣读交接备忘录。会议厅布置简洁肃穆、庄重威

严。正面悬挂青天白日国旗和国父孙中山先生遗像,再上是中、美、英、苏国徽一字排开,一个象征普天同庆世界和平的巨型“V”字将所有悬挂物高高托起。

肖毅肃中将威严端坐正中,左边坐着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波特勒,右边是冷欣中将。其余参加的军官、宾客及中外记者达百余人。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冈雄、木村辰男被召见时,仍身带武士刀,经命令解除后方准进入会场。日洽降四代表入场后,首先向肖毅肃等行礼后,旋即坐于对面座上。日方代表呈上日军在华兵力配备图,肖毅肃宣读了中字第一号备忘录,交与今井,嘱其转呈冈村宁次遵照执行。在交接洗刷中华民族耻辱的中字第一号备忘录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及部分嘉宾纷纷抢前拍照,记下这一庄严的一幕。会毕,何应钦上将接见了日方洽降代表。当晚由肖毅肃中将作东在营区宴请中美军官,庆贺洽降顺利进行。

可能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觉得这一关系民族声望的大事在都城签字妥当。因此,决定改在南京举行。22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特级上将蒋中正电渝何应钦:“未马午电悉,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条款,签字地点,决在南京。”23日上午9时,今井等日方代表仍乘原机飞抵南京。芷江则随之改为办理日军洽降之地点,以后各项工作奔新目标,按新要求去进行。

至此,日军芷江洽降基本结束,我们将善后工作移交由云南空运来的陆军总部及兵站司令部,仍归原部待命。

在抗战胜利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吾将芷江洽降的亲历亲闻披露出来,既是想完成一项责无旁贷、不容推诿的责任,又想奉劝人们反对毁灭一切的侵略战争,世代和平,普天同亲共乐,更重要的是反驳近年来日本一些人滋生出的企图逃脱侵我中华罪责之思潮及言论。

(责编 李茂盛)

(上接31页)

由自主地插言道:“罗副司令长官对部属一向体察入微,爱兵如子,新四军的武器之低劣,长官已亲眼所见。三战区已催促敝军前移,深入敌后,这样的武器装备和日军作战,不能不令人担忧啊!”

项英说的话有恭维的成份,但也是心里话。

尽管叶挺、项英曲意应酬,反复说明,这些老红军游击队人瘦骨头硬,可以在任何困难条件下坚持战斗,定能像连战皆捷的华北八路军那样,成为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但因政治立场的差异,罗卓英和他的“点验委员”们,仍坚持他们的看法,人多枪少,身体素质差,现有的编制还要压缩。为了满足“点验委员”们的权势欲望,通过点验这一关,叶挺和项英都表示,可以按照

点验的要求再作精简。实际上是结合新四军内部的整编,作了一些把部份干部战士送教导队培训,放到下面去充实基层,把宣传队和华侨服务队上调军部之类的调整。

送走了罗卓英等“点验委员”之后,叶挺、项英回到办公室,都如释负重般地吁了一口气。项英对叶挺这几天的表现颇为满意,高兴地说:“军长啊,你对付罗卓英真有办法,于公于私,都很得体适当。”叶挺也微笑着幽默地说:“谁让他在政府编制表上是我们新四军顶头上司的战区分司令长官,又兼老同乡、老同学、老同事呢!”说完,两人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

(责编 启元)